

书人茶话

全球化潮流中的古代中国与世界

刘元杰

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全球化潮流在近年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许多研究古代中国与全球化潮流的著作。以书为媒，我们得以回顾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时期在全球化潮流中的作为，也看到了在全球化潮流中，古代中国社会上极大的张力，古代中国与世界紧密的连接和区域间相互依存共同体的形成，破除成见，寻幽入微，鉴古思今，启以新知。

反思：“闭关”和“开放”的话语背景

在我们的印象中，谈到“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闭关”和“开放”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而且这两个词有意无意地被注入了超越外贸领域的内涵，成为探讨中国在近代前夜落后世界原因的常用话语。本来中性的两个词，前者成了“病根”，而后者则是“药方”。一些历史读物称，从晚明至清代鸦片战争前的这300多年，古代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海禁”政策扼杀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也使得中国社会在19世纪以极端保守和封闭的面貌走向近代化的世界。我们不能否认“闭关”在明清时期对中国全球化进程的负面作用，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否自始至终是“闭关锁国”和“海禁”，用“闭关”和“开放”的话语描述古代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话语背景，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正如《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一书的作者段晓琳所察觉的，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个“西方崛起”的神话，叙述着欧洲对世界的主宰。“闭关”和“开放”这组词就是这种西方神话的体现，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郭蕴静从清代史籍文献中并未发现“闭关锁国”，西方是这一词的原创者，他们迫切希望扩大中国市场，愤于清政府的种种限制，而将之强加于清政府；陈尚胜提出，“闭关”和“开放”这组词产生于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奠定大机器生产格局后，与其贸易扩张和殖民侵略需要密切相关。

当我们翻开郭建龙所著《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

深入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就能发现这个“西方崛起”的神话漏洞百出。明清时期不缺乏“开放”，把近代落后归罪于“闭关”显得左支右绌。明朝隆庆年间废除海禁政策，海外贸易繁荣，并且明朝的“开放”并没有停留在贸易领域，在知识领域也经历了一次开放性的活动，掀起了翻译浪潮，引入几乎所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且不仅是翻译，每一门学科都有人研究并转化为真正的知识，崇祯晚期还出现了足以媲美洋务运动、甚至更为开明的奏议。

清朝康熙时代设立海关和关府，进入四口通商的黄金时代，也是科学技术在古代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的观象台用于测定60°以内任意两个天体的角距离和日月角直径的六分仪正是在这一时期设计铸造成。《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的作者卫周安就列举出大量事实证实，19世纪末中国人参与到更广泛的世界交往中已经是常态，那些源自西方殖民列强的刻板印象都是一种误解和偏见，但它们非常成功地削弱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这三部著作使我们意识到，“闭关”和“开放”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认识古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进一步明确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它有着广泛的历史原因，“闭关锁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把落后完全归罪于它，其实是过于夸大了。

还原：“官方”和“民间”的一张一弛

反思和纠正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崛起”神话和“中国孤立”的偏见，重塑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晚明至晚清鸦片战争前，中国与海外的交流虽然并未彻底中断，还有过令人振奋的西学东渐，但这种时期只是吉光片羽，转瞬即逝。

古代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最终回归到封闭的原因，《失去的三百年》将之归结为制度惯性。封建集权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终导致权力重新闭塞，走向一个结局：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郭建龙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全球潮流》[美]卫周安著 王敬雅 张歌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尤物：太平洋的丝绸全球史》段晓琳著 柴梦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出版

重新封闭，更加封闭。作者提醒我们，晚清的闭关锁国，恰好是明末的大开放逐渐演化来的，也就是说，明末引入科学技术只是表面的开放，是维护封建皇权的手段，一旦对维护权力失去作用，就会弃之如敝屣。《北京的六分仪》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古代中国的开放只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性地引入外国的事物，因为当权者担心外国的意识形态战胜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从而失去对这些人的政治和道德控制。

从这三部著作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商人和海盗为中心的“民间”和以皇帝为中心的精英群体的“官方”，在全球化潮流中显示出很强的张力，形成了两个并行却不相交的世界，前者看到海外巨变，但无法传达给后者，后者则彻底忘记了西学东渐的一切。

《北京的六分仪》开篇就拿出海盗头子张宝的经历，说明了来自民间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在积极地利用外国人和他们的技术。海盗经常利用抓捕到外国人的，向他们学习专业的炮术和医药学知识，以及读写外文的能力。明朝实行“海禁”这一严格的对外贸易限制，导致合法贸易渠道不畅，刺激了走私活动，海盗因其海上活动能力强，参与到这种非法贸易中，于

是海盗集团往往兼有海盗和走私双重身份。张宝是幸运的，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而更多的积极与外国交往的民间人士，只能以他们从事的行业称其为渔民、小贩、樵夫、店主、米贩子、水手……

“官方”的禁止并未完全切断“民间”的海外贸易，《失去的三百年》敏锐地观察到，在太祖朱元璋死后，严格的政治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之后的皇帝很少拥有完全独裁的权力，地方官员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会对过于干扰民间的中央命令采取软性抵制，这就使得沿海地区与海外的交流并没有真正中断，只是不让皇帝知道罢了。在隆庆开关前的成化、弘治年间，已经有许多人通过走私发了财，民间一直在地下进行贸易。

海外华商的经历也生动地反映了“官方”和“民间”的张力。晚明时期海禁开放，沿海的中国人选择到海外做买卖，带来了华人移居海外的高峰。康熙时期僧人大汕因出国通洋而被指控的案列，说明了“官方”开放海禁只是有限地在商贸层面的开放，甚至对商贸也有严格的限制，康熙皇帝虽然解禁了华商，但封建集权制度完全不信任民间，不允许民间自我管理，从各方面监督民间活动。华商只准用五百石以下的船，商船禁用双

桅，使得中国的海船缺乏跨越大洲的运行能力，只能在南洋贸易。“民间实力的减弱，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还包括政府的军事实力”，最终清政府狼狈地进入了近代，这个衰落的政权在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下走向灭亡。

全球市场的扩大，并衍生出足以挑战国家威权的商业力量。《尤物》说明了世界市场对丝绸需求的增长，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和墨西哥的丝绸时尚与蚕业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则促使两个国家产生外贸和阶级层面的争端。丝绸品的消费见证了市场价值体系的完善，生丝与丝织品成为“尤物”，使个人和社会在不断变化的时间和空间中找寻并重构自己的地位，从而逐渐摆脱国家的控制，而这些都是在全球各地区连接日益紧密、依存程度加强后的连锁反应。

《尤物》通过研究丝绸来展现十七六世纪的全球化面貌。丝绸跨越国家和地区，促成了消费模式的形成，传播了科技，加速了近代移民热潮，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通过丝绸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我们可以看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并不是印象中长期缺乏往来，反而是日益连接紧密，相互依存。《尤物》从时尚追求异国情调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丝绸在西班牙帝国的流行，从中国传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美洲，最终穿戴在秘鲁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后代的身上的历程。有意思的是，丝织品在全球流通过程中出现回收和仿制的时尚，在清朝入关后，明朝官服的补子被运到了美洲，它们成为通货、收藏和重复使用的材料，衍生出墨西哥丝织品中的新设计。饰有鹦鹉纹样的墨西哥挂毯，把亚洲元素与欧洲文化符号结合，经墨西哥工匠之手，融汇了本土风格与外来风格，是十六七世纪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区相互依存的缩影。

这三部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全球化进程的著作，尽管采用了不同书写方式，有在全球语境中书写中国地方史，也有以地方为基础叙述全球故事，但都力图破除单一维度思考的障碍。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是自始至终、自上而下地处于极度封闭和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状态，中国的发展也不完全是受外部驱动，对外交往也是有进有出，非单向地被动应对。今天，全球化方兴未艾，各国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倡导的是更加平等、包容的全球化模式，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和回应。回顾历史，破立之后，我们更加期待着更加公正、合理、和平的全球秩序的出现。

启示：“连接”和“依存”的共同体

“官方”虽然采取了种种手段阻碍海外贸易的进行，但从来没有任何要完全终止海外贸易的计划，地方官员的默许，使贸易在地下持续进行，形成了沿海地区的移民群体，他们在“民间”保持了古代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在全球化潮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至今却又被我们忽视。

海外移民的脚步遍及世界，超乎我们的想象。至今墨西哥中部仍把一种刺绣女士衬衫称为“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这种衬衫的命名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海上生丝与丝织品贸易，《尤物》一书便是从太平洋丝绸贸易展开全球化的研究。

十六七世纪的全球化规模远比我们印象中要大，各地区连接紧密，相互依存，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非洲人或美洲各地原住民穿戴中国丝绸，中国人和农民使用西班牙银元，这才是当时的面貌。生丝和丝织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产量促进

甘棠之华(五)

“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

——巴金《旅途通讯》及其他

周立民



《旅途通讯》巴金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9年出版

巴金的文字平白如话，早年，感情澎湃，中年以后，逐渐节制。到了晚年，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声嘶力竭的呼号没有了，时常是自己在默默倾诉，看似平静，却波涛汹涌。《怀念萧珊》中有一段很平淡的叙述：

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那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中、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

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叙述她与妻子30多年同甘共苦的经历，巴金的笔却落在两册薄薄的小书上。《旅途通讯》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附在初版本下册正文后面的广告说得很准确：

这是将近一年来作者从空袭的威胁下，从炮火的火焰中递给我们的一些真切的报告和写真。他生活在日夜被敌机骚扰的广州，到过临危的武汉，守到广州的最后，又长途跋涉到了受尽淫威的西南重镇桂林。随着作者艰辛的行踪，充满我们视线的是：血！火！刽子手的残酷！一方面还有使我们振奋的同胞们沉着苦斗的精神，和促人警惕的有碍这新生个体的成长的病原菌。

这是两册薄薄的小册子，全稿16篇，分上下两册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出版于1939年3月和4月。不知巴金的两位朋友何以批评“这算什么文章”，是因为只是写了个人的印象、行踪、见闻，没有表现民族灾难的最真切的记录。大约是一个朋友的影响，巴金的各种集子在不同时期屡屡重印，这部小书却不曾重印。直到巴金去世后，后人编单行本才得以重印（东方出版社2017年8月版）。不过，正如巴金所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1月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中，它被全文收入，可以说这书中不仅有巴金的行踪，还有他心灵的秘密。

从广州到桂林的逃难路上，萧珊陪伴在巴金身旁，可是读《旅途通讯》几乎没有一行字提到萧珊。作家的写作很奇妙，他可以在文字中隐藏很多秘密的东西，只有自己才能读得出。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弟弟张宗和1944年写过《秋灯忆语》，里面提到1938年与巴金同船逃出广州的事情。当时他们共有十人：林语堂的哥哥林德庐和儿子及三位“宇宙风”杂志职员共五人，巴金和弟弟李采臣及萧珊三人，再就是张宗和与女友两人。他文中倒是提到一句萧珊（“陈小姐”）：“巴金先生和他的女友很亲热，陈小姐很会撒娇，我们常常背后笑他们。”（《秋灯忆语》第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俩人正在热恋中，那是他们一生最艰难的日子，也是最难忘的甜蜜时光。1955年3月28日火车上重过旧地，巴金以少有的抒情笔调给萧珊写信：“今晨过坪石，重经十七年前的旧路，

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十七年前的旅行犹在眼前。‘银盏坳……’你还记得吗？……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足迹。昨晚在车上我又梦见你了，朋友，那是十几年前的你啊！”（《家书》第202页）

平常读《旅途通讯》，我多用《巴金全集》本，不曾注意在初版的《旅途通讯》上册卷首作者是有献词的：

献给LP。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这个朋友的热情温暖了我的心。——巴金

原来他曾如此直白地表达过内心的情感。“疑惑不安的日子”出自巴金翻译过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关于（火）》）看来，不仅有语言和信仰，支持巴金还有在身旁的萧珊。

短短的献词中，我们能够看出萧珊在巴金生命中的位置。可惜，后来的重印中它被删除了。所幸在《秋》的序中巴金再次提到在艰苦的日子里有四个人鼓舞了他，以致改变了小说预定的灰色结局，“我现在把这本书献给他们”：“远在成都的WL，在石屏的CT，在昆明的LP，和我的哥哥。”在开明1940年版、平明1953年版和人文1955年版《秋》中，序言中这些人名都是字母，直到《秋》收入《巴金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巴金才加了注释，把这些人物的身份公布于众：“WL是1927年1月和我同去法国的朋友卫惠林；CT是散文作家廖慕群。1945年1月病死于重庆；LP当时是我的未婚妻，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我的哥哥李尧林1945年11月在上海病故。”1982年7月《秋》收入《巴金选集》第三卷，巴金在这个注释中添上萧珊的名字：“LP即萧珊……”而此时，萧珊已经去世近十年。

1939年，《旅途通讯》的献词中，巴金称萧珊为“这个朋友”；1979年，《怀念萧珊》中，他称她为“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并且说：“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有一个人陪在身边，说“我不会离开你”，那是多大的幸福！难怪，这段情感到刻骨铭心。

2024年11月10日深夜里、劳碌中

记得2019年12月，我和陈尚君、周裕锴、齐文榜三位教授受邀同赴日本京都参加“贾岛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位学者主题发言后都有一个“对话”，尚君先生发言后我作了一个简谈，提到了他勤勉蒐考唐代佚诗，在力求为每个唐代诗人、每篇作品建立文档，“欲以构造真正的唐诗殿堂而自任”。

回国之后，紧接着就是三年疫情。不过起伏之间彼此联系颇为密切。因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唐代文学卷》主编，刘宁老师和担任副主编，众多稿件刘老师和初审稿改后一例交他终审修订，这个过程中深感他在学术积累中腹笥日富，唐诗殿堂不断成型。我们又一起出席了首都图书馆和上海书展的对话会，沪上书展时，《唐五代诗全编》试读本已印出，阅后对其海量蒐辑，坚实考证，在自立体例、自构空间中能够任性表达的印象极深，将“坚持”与“任性”一并作为编纂工作的特点提出。“任性”一词或有歧义，然尚君心契首肯。

秋分时节，上海古籍出版社装满五箱的《唐五代诗全编》寄达，即发信给尚君先生说：“已收到，未启封，待吉时。”后以每学期一次在家中读书会（方便学生借书）的机会和十多位博硕士、博士后、访问学者一起正式启封，将煌煌50册大书排放在大几上，一放就近一个月。我同时将清编《全唐诗》全数并置，以便比较阅读。连续比读有些累，但乐在其中，惊羨更多。虽然我算是最了解他开展这一规模浩大工程进展者之一，但面对巨著，直观体会其以一人之力抗衡扬州诗局的勇毅——一个人投入长达40余年时间与300多年前十个在籍翰林较力——还是由衷叹服的。

1992年初，尚君先生主笔与我曾合作撰写《〈全唐诗〉的缺憾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一文，发表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当时提出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诗》应当按照新的时代要求，充分反映我国唐诗研究整理的水平，“要达到这一目标，仅在扬州诗局本《全唐诗》的基础上作修补改编显然是不够的，而应该充分利用存世文献，重新编纂，并在辑佚、校勘、辨伪、小传诸方面，都达到超越前人的学术质量。”我知道，要真正做到这一目标是极其困难的，非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绝难告成。次第数着冬往春归，静心看着木落花开，终于宏业竣事，理想实现。新出版的《唐五代诗全编》已经超越了清编《全唐诗》“升级版”的规模和质量，拉近了“让唐诗回到唐朝”的全新境地。

平心看清编《全唐诗》，自有可称之处。玄奘帝命诸词臣将原本“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时代分置次第”，这是编辑观念的进步；曹寅作为董其昌役者，对全稿审阅，发现晚唐诗小传缺漏太多，力求补充，也非虚领其銜；十位在籍翰林皆拥有优良的墨客韵士，在文本分辨上尤有见地。但对扬州诗局而言，这毕竟是一项奉命编纂、翻雕盛代之事，经年有余便匆匆奉稿，焉能不错讹丛生？不要说戴叔伦、唐彦谦等掺入不少伪作的集子混进了《全唐诗》，连明人几乎完全伪作的《牟融集》竟也收入。至于遗漏，更不知其数。朱彝尊当时曾发现遗缺，有所补充，鉴于全稿已经奉

在读

精心构造唐诗殿堂 以四十年的坚持

罗时进



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之路研究会副会长等



《唐五代诗全编》陈尚君 纂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便噤声不提。清人深知《全唐诗》为“御制”，即使知其存在种种问题，也罕发声，更不敢措手修订。

一代唐人诗直造诗歌顶峰，而一部《全唐诗》却如残璧玉，其流传不衰的过程也使谬误沿袭。史学、文学研究界都在沉默中等待，终于在辛亥变局发生的前三年(1908)，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四卷九期

发表了指瑕性的《读〈全唐诗〉发微》。其文虽属读书札记，但起笔便直陈“《全唐诗》一书，收辑之富，为识者所共识。然卷帙既繁，考核未精，故误收之作甚多”；转笔又称“《全唐诗》中多载作者自注之词，亦有以后人之注为作者自注者。”所言虽不能拨云见日，但黎明前的微曦亦可照人。“没有中便没有真理”（黑格尔语意），在闻一多、李嘉言师力倡重订《全唐诗》前后，刘师培或为“中介”，闻、李二先生的前伸、后延线很长，但真正堪称重编《全唐诗》“托命人”的无疑是陈尚君先生。

“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德里达语），要理解《唐五代诗全编》的成就，需立足卷帙厚重的文本。我是从长达百页的《前言》读起，然后借助用心编制的《作者索引》，选熟悉的诗人集本先读，次及学界讨论辩证较多的诗集、重要作家作品等。号称通阅，实为走马，不足一个月时间岂能逐卷目验？但对编纂成就，也略可陈说诸方面。其草率大端者如下：

一是“全编”名实相副。唐代号为诗国，作者动辄“千首诗轻万户侯”，历史烟尘深远，不知埋没了多少诗人和作品。全书收诗4000余位诗人，55000余首古诗。相较于清编《全唐诗》录作者2567人，收诗49403首又佚句若干（其中误收唐前或宋后诗超1200首，互见诗约6800首），《全编》的阙佚（含修订校补《外编》）之功效为突出，诗人数量增加1400余人，诗歌作品增加几以万首计，这是目前“求全”意旨最充分的实现了。他本人以及学界往后应还会有所增补，都无碍今日“全编”之名的成立。

二是“求真”尽显本心。求真，首先要剔除混入清编《全唐诗》中的伪诗。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列出的首要即：“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前人和时贤循道而行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尚君进行了更彻底的筛选；其次要鉴别重出互见。《全编》综汇各家论说，辨别歧异更趋细密，强化证据，使唐诗“各回各家（诗）家”；另外，他明确表达尊情情结，以坚定的态度走“经宋回唐”的道路，凡小传撰写、版本选择，比校校勘、考按举证，皆实践“尊宋”主张，最大程度“还原唐诗面貌”。

三是“开放”体现善意。循名责实，尊宋推原，具有较客观的客观性；而一代唐诗《全编》，需要形成一个完备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建构性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全编》力竭词殫而渔，遍校群书，但网罗无遗也有相对性；阐释者进入新的语境，对建构系统有不同的言说立场。尚君深明此理，在合理编次、严谨校勘之外，在必要之处附录了详实的本事史料，卷后列《存目》，全编列《别卷》，留下“唐诗”流传的丰富痕迹，善意地架构出一个开放格局。有争议的问题，当断则断；而有疑则存疑，让渡出讨论空间，便于学界继续研究。

近一个月沉浸摩挲《唐五代诗全编》，深感唐诗殿堂之辉煌，而40年无比勇毅地坚持，是何等不易！写出此内心的，借以表达对尚君先生的衷心祝贺，以及后人的叹慕。